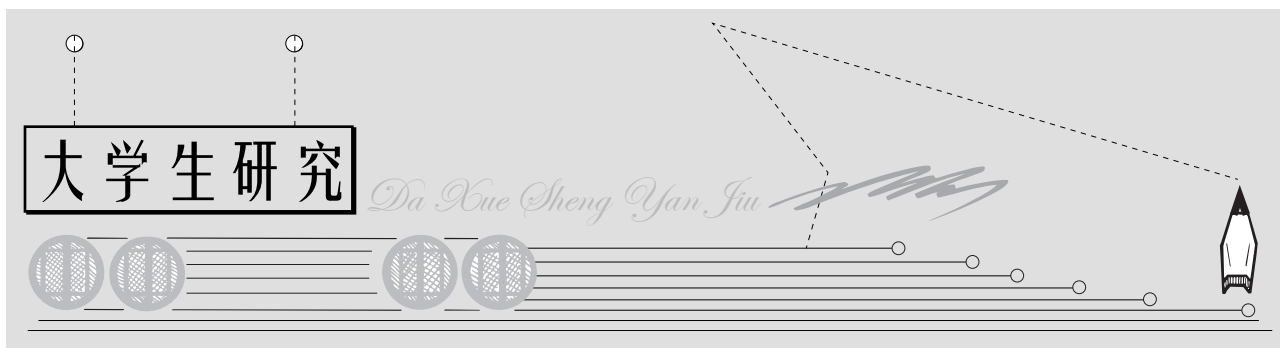




■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群体发展 及其对社会变迁的作用研究 ■

□ 邓希泉

摘 要：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变化，就是在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全面、深刻的社会变迁。大学生群体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鲜明的社会成果和最直接的社会表征，规模迅速壮大的大学生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影响因素，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和职业分布经历重大变迁，大学生群体作为人才的主要主体力量并承担创新创业的历史重任。大学生群体结构的巨大变化，全面深入地嵌入社会变迁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整体变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分别是大学学历成为社会流动的决定性要素、大学生自主择业和创新创业及其竞争作为社会流动的动力与加速市场要素社会化配置的进程、大学生群体作为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主体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变迁、大学生群体作为志愿者主体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以及大学生群体的区域结构分布对社会结构的失衡与调整的影响等。

关键词：改革开放；大学生；发展；社会变迁；作用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084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全局性变革，社会变迁是改革开放引发的最明显社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区域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是改革开放初期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恢复高考是我国改革的先声，出国留学则是我国开放的前奏^[1]。社会流动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最直观的表征。以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最公平最广泛

的发展路径，充分体现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改变命运的社会流动规律。知识不仅改变个人的命运，也是改变国家命运的基础和途径。教育和高考成为主导的社会流动方式，学历和文凭等成为社会分层的关键性标准，造就一个日益庞大且社会特征鲜明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治理方式共处同一历史进程，并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学生群体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体现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社会群体，大学生群体既得益于改革开放造就的大量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又通过形成更加富有活力的创新发展动力而促进更好更快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

一、我国大学生群体发展的主要表现及其特征

大学生群体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鲜明的社会成果和最直接的社会表征。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群体（包括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社会群体与在校大学生群体）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群体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地位日益提升，社会作用不断凸显。

1. 规模迅速壮大的大学生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影响因素

大学生群体曾经属于我国社会结构中规模很小的社会群体。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大学生群体规模仅为288万人，仅占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的0.5%。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数量虽然在缓慢增长，但经过18年的发展，大学生群体规模也只是增长为601.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只有0.68%，占比依然没有超过1%。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规模升高至1575.7万，在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1.59%。1999年以后，我国大学生群体发展进入高速增长区间，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规模已经超过4400万，10年增长了近3000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大学生群体规模突破了1亿，达到11837.5万，在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9.53%。

从大学生群体的年度变化情况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85年，每年大学生增加数量都没有超过40万；1986年至1999年，每年大学生增加数量在40万到99万之间；2000年，每年大学生增加数量首次超过100万，2003年将近200万，2005年超过300万，2006年超过400万，2008年超过500万，2010年超过600万，2014年超过700万，自此以后，大学生群体每年增加人数均保持在700万以上。大学生群体规模处在指数提升的发展区间。由此可见，不断扩大

的群体规模，奠定了大学生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无论是在群体规模还是群体作用等方面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

2. 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和职业分布经历重大变迁

伴随大学生群体规模扩大和社会地位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和职业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高等教育性质的变化引起大学生群体社会属性的巨大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质的变化，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明显表征，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也迅速从精英属性向普通大众属性过渡。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同比由1978年的16.5万增至2017年的735.8万，增加了43.59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0年的3.4%迅速增至2002年的15%，由此实现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经过15年的再发展，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为45.7%，是1990年的12.44倍，充分表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属性，由此凸显大学生群体从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等社会属性向普通公众的社会身份快速转换。

二是基层就业导向改变了大学生群体职业分布上的精英局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要求由团中央、教育部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由此揭开大学生群体到基层就业的政策先声。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意见》，开始实施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基层“三支一扶”（即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2006年开始实行“特岗教师”计划，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大学生村官”项目推进实施。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表明大学生基层就业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3年至2017年之间所开展的8次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基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大多数“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实现就业，但这部分毕业生的占比在逐年递减”“私营企业在2011年后就成为吸纳毕业生基层就业的主要单位”^[2]。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是在国家意志倡导下的逆市场的人力资源配置，目的是促进更合理高效的人力资源配置格局。

到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为10.3万人，有5万多人进入村“两委”班子，9000多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全国大学生村官累计流动37.2万，其中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为13.6万人，进入事业单位的为11.7万人^[3]。从2004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以来，累计有16万名毕业大学生参加，1.6万名服务期满留当地工作，目前在岗3万人。大学生基层就业，尤其是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等大学毕业生充实基层政权，有利于增强社会底层的群体力量，成为国家主导的青年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新路径；强化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者队伍和治理能力，有利于底层群体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时代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表1：不同人才类型的人才学历层次分布

人才类型	总量（人）	研究生（%）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中专及以下（%）
党政人才	7289804	11.1	68.4	18.9	1.6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43341190	3.6	31.6	33.1	31.7
专业技术人才	73281096	5.2	38.9	31.8	24.1
高技能人才	45010000	——	——	——	——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759229	2.4	28.3	25.7	——
农村实用人才	16923021	5.3			高中25.8，初中57.1 小学10.4，未上过学1.4

数据主要来源：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2015》，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表内数据由作者整理加工。

清末以来，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力量，被寄予厚望。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关注、关心和关怀青年。大学生群体是社会精英群体的主要来源，是青年群体中具有明显特殊性的亚群体。作为一个有着类似的年龄阶段、社会化任务、发展诉求、社会角色期待构成的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地位快速跃升，日益成为青年群体的核心群体和代表群体；社会作用不断凸显，在国家政策体系中由边缘地位发展到中心区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与青年群体进行互动时，一般是走进大学生群体之中，通过对大学生提出期望并推及全体青年。大学生群体成为了青年群体发展的风向标，成为青年群体社会作用大小的指示器。大学生群体的变化与变革，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又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创新创业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大学生群体的历史责任转变为以创新创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3. 大学生群体作为人才的主要主体力量并承担创新创业的历史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 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根据形势发展和现实需要，我国人才划分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共6大类。表1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在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中占比分别为98.4%、75.9%、68.3%和56.4%，表明大学生群体是这4大类人才的主体力量。

兴为主要内容。

二、大学生群体发展对我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于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现有研究，很多都是从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视角，研究探讨青年与社会变迁尤其是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总结休谟（David Hume）、孔德（Auguste Comt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人关于代的研究的基础上，对代际更替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4]。直接探讨青年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其历史机遇在于20世纪60年代全球兴起的青年反抗与学生运动浪潮。理查德·弗拉克斯（Richard Flacks）从青年所归属的社会阶层（家庭）和社会活动场域（社会群体）两个方面的文化变迁，反映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

响^[5]。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总是处在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历史，青年群体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桑兵研究了晚清学堂及其培养的学生对社会变迁的影响^[6]，吕芳上研究了中华民国时期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与社会变迁的关系^[7]，陈映芳从清末青年到当代中国青年进行了历史纵深的描绘，立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研究青年群体的演变^[8]。但是，现有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政权更迭，即以革命为特征的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群体的变化。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变迁，实质是在政权稳固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等社会的众多方面。伴随改革开放而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参与力量，大学生群体的变化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我国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尝试从青年群体发展全面嵌入社会变迁并作为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研究。

1. 知识改变命运：大学学历成为社会流动的决定性要素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城乡户籍的身份分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分层、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身份分层等多重社会分层结合下的多重二元社会分层体系。改革开放后，通过教育尤其是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是打破多重二元社会分层体系并获得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不断走向开放社会和公平社会的一种社会动力。

1977年，中国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制度，恢复考试制度，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取消家庭出身决定下的推荐制度。恢复高考，使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一条主要途径，改变了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决定性作用。考试重新成为选拔大学生的主要标准，意味着社会流动的决定性要素从先赋因素到获致因素的转变。一项通过对12个省市7522对城镇代际数据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城镇，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弱势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实现经济地位的跃升，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9]。通过对人口大省河南省11个市22个村庄实现社会流动的570名青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升学是农村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的且一直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10]。由此可见，社会流动中的决定性因素，日益从先赋因素转变为获致因素，在推动社会流动公平的同

时，为正向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社会流动的主导机制在由先赋因素转变为获致因素的同时，大学学历成为首要的基本要求，凸显了职业门槛的提升与社会屏蔽制度的重大变化。帕金（Frank Parkin）在基于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屏蔽理论，也就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合法手段设置准入门槛，以社会屏蔽和社会排他来维护本社会集团的利益，由此实现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社会屏蔽制度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一是财产制度，二是职业资格、专业资历和技术证书制度^[11]。改革开放后，以大学学历为重要标准的职业门槛和社会屏蔽制度成为社会分层的明显标志。“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分层、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

与此同时，大学学历成为公务员选拔尤其是中高级公务员的关键标准。一直以来，干部选拔标准是全社会人才选拔的风向标。文凭和学历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选拔任用和人大代表的选举履职中得以凸显。1982年12月，干部的四化标准（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由此，文凭和学历在干部选拔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学历或更高学历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条件，表明大学生群体所拥有的文凭和学历取得了人才评定标准的第一位的地位。无论是党政领导干部，还是人大代表的选举，大学生群体因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获得了制度确认的优先机会甚至是独特机会。省级、地级和县级三级党委班子成员中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占比不断提高。从省级党委班子成员看，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占比由1980年的15.5%提升至1997年的93.7%；从地级党委班子成员看，相应比例由4.0%增至91.7%；从县级党委班子成员看，相应比例则由3.3%增至85.3%^[13]。

从领导干部的任命情况看，1983年3月至1985年9月，国务院系统81个部级领导班子、各省级领导班子、地（市、州、盟）和省属部、委、厅、局、县（区、旗）级领导班子、全国29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领导班子，都按照干部“四化”标准进行了调整，其中，年轻化和知识化成为最可衡量的硬性条件，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均大幅提升。1983年，29个省级领导班子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由原来

的20%提高到43%，其中19个省级班子在两年后的调整中再增至80%；地（市、州、盟）和省属部、委、厅、局的领导班子，由原来的14%提高到44%；1984年，县级领导班子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由原来的10.8%提高到45%，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增加至15.4%；1985年，国务院系统81个部级领导班子由原来的27.5%提高到71%；19个省（市、区）省级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后增至80%。

从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看，在县级人大代表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代表的占比，由1981年的5.38%增至2006年至2008年的61.96%；在2006年至2008年，市级人大、省级人大和全国人大的代表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代表的占比分别高达80.00%、89.23%和92.00%，大学学历基本成为县级及以上人大代表的标配^{[14][15]}。同时，在一些重要的行业领域我国引进和实行国际通行的执业资格制度。1986年，《注册会计师条例》颁布，标志着中国建立起第一项专业技术执业资格制度。1994年，职业的资格标准和录用标准予以明确，开始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目前，中国的注册监理师、注册城市规划师在学历方面的报考条件最低为大专，法律资格证、注册税务师、注册金融分析师在学历方面的要求是具备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总的来看，当前社会分层采用的是以文凭、学历、职业资格和技术证书等作为一种体现“个体排他”（individualist exclusion）的方式，取代了以血统论、身份论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排他”（collectivist exclusion）的方式，不再是把某一个阶层或社会群体整体排除在外，而是通过公平的资格限定方式来鼓励个人参与并推动个人竞争。

2. 打破“铁饭碗”与大学生自主择业：竞争作为社会流动的动力与加速市场要素社会化配置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前，大学生是一种相当稀缺的社会资源，大学生就业政策实行“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方针，由国家在计划框架内实行资源配置，其核心是“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所谓统包统分，就是高校学生入学后的培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毕业后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单位就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当时中国高等人力资源相对匮乏，通过国家统筹使用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使大学生自从进入大学校门后便获得了实际上的“铁饭碗”，在学习过程中

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和危机意识，在就业过程中缺乏自主性、主体性和竞争性。因此，作为重要市场要素的大学生，不能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市场配置和合理流动，甚至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最难打破的“铁饭碗”，既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又不利于人才的合理配置和使用。

1985年，高校招生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开始改革，其中，大学生就业开始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1986年8月，沈阳防爆机械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破产倒闭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标志着新中国公有制企业不能倒闭的理论误区和思维误区被打破，需要在市场中通过竞争去获得生存发展。1987年，全国共有5000名大学毕业生被接收单位退回，从一般意义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1989年，大学生就业开始实行以学校为主转向社会推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1993年，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1996年，实行全体毕业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为主”。1999年，大学生就业实行“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制度。至此，大学生毕业必须获得工作岗位的观念得以破除，扫除了横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突破的一个相当大的屏障。表2的数据显示，有一半左右的在职青年在调查时点最近一年内发生过工作岗位的变动，工作岗位变动的平

表2：在职青年在调查时点最近一年内职业变动情况

调查实施年份	工作岗位没有变动 (%)	工作岗位发生变动 (%)	工作岗位平均变动次数 (次)	调查人数 (人)	调查范围
2007年	51.0	49.0	1.92	N=2357	全国
2009年	26.0	74.0	3.0	N=3282	全国
2009年	58.9	41.1	1.75	N=3158	上海
2010年	58.1	41.9	1.72	N=2556	苏州
2016年	48.5	51.5	2.16	N=7364	北京

注：2007年全国数据来源于风笑天教授2007年在全国12个城市进行的“城市在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200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11月至12月组织实施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2009年上海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上海团市委进行的“上海青年发展状况调查”；2010年苏州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苏州团市委进行的“苏州青年发展状况调查”；2016年北京数据来源于北京团市委进行的“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

均次数在2次左右。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的自主选择和市场导向,使大学生群体自由自主地成为市场要素,加速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市场要素的社会化配置进程,同时也促进了职业青年尤其是在职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流动,由此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3. 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高学历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阶层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共5个等级的10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6]。同时,白领阶层、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阶层新现象,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新元素。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动中,教育与文化程度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和农村教育收益率都迅速攀升,“以大学教育来看,在1991年~2000年之间教育收益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按照复式增长率计算,大学本科教育收益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约为36.4%;使用本文所估计的结果,在2002年~2009年之间,大学本科教育收益率的复式增长率约为3.9%”^[17],由此使大学生群体在社会流动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大学生群体拥有了向上流动的更多机会和空间,更容易进入职业声望、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好的行业和职业,成为了白领阶层、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的主体力量。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主要分布在平均工资较高、职业声望较好的行业。具体来看,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行业等领域,就业人员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均超过半数。与2000年行业分布情况相比,这些平均工资较高、职业声望较好的行业,或者是作为新兴行业而出现,或者是作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大幅增长的传统文化行业。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迁,推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大学生群体日益占据优质岗位和

优势行业,意味着不断壮大的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促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组与变迁,推动着中国形成更趋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4. 大学生群体积极从事志愿服务: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社会建设的强化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社会变迁的新内涵,也是社会变迁的新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志愿服务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大学生群体作为其中的支柱性力量,充分发挥了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建设进程的积极作用。秉承传统文化的助人自助基因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强大惯性,志愿服务成为一种交换和建立社会资本、构建生活共同体的有效方式,其社会价值在于通过志愿服务重新明确邻里、社区和城市的相互关系及其彼此的功能,强化横向和纵向的社会资本的纽带作用,通过互助推动人们日常生活的重新构建,是当代城市社区秩序重建、架构重建的实现路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设。1993年12月,在共青团中央号召下,2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帜。2003年6月,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10万赛会志愿者中,大学生志愿者共计为84000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历次调查数据也显示,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一直大大高于其他青年。可以说,大学生志愿者的社区服务,推动高校与社区的互动,增强了地区 and 全社会的社会资本。志愿行动在中国的兴起与大学生作为志愿行动的主力,推动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了社会和谐。

5.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与调整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有计划地对各种人、财、物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无偿划拨和配置,刻意缩小地区差异,但导致平均主义现象严重。改革开放后,中央的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国家投资更集中向条件相对较好和效益更高的地区倾斜,沿海地区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允许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激励下,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差异逐渐明显,形成了明显的东、中、西三个经济发展带。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对人才吸引力更大。大学生在逐渐获得就业自主权和流动自由权之后,不断涌向大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出现了区域、省际和地区之间人才的巨大差异。“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

外地一套房”“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向深圳、广州)、“扎堆北上广深”(人才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鲜明地表现了人才和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线城市聚集、不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就业的社会现象。通过对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年份各省份人均GDP的比较可以发现,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1982年,省份人均GDP最高与最低间相差12.53倍;1990年为7.35倍,2000年为10.91倍,2010年为5.75倍。同时,省际间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的差距也较大。1982年,省份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最高与最低间相差14.20倍;1990年为15.31倍,2000年为12.13倍,2010年为5.66倍。无论是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均呈现出一种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的状态。

通过对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年份各省份人均GDP的比较还可以发现,一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优势(即省份人均GDP相对于全国人均GDP的值),与其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的相对优势(即省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全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的值)成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的比值在1的上下波动。也就是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也越高;省际间的大学生占比差值越大,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越大。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不断趋向全国人均GDP,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失衡进行了调整与改善,既采取措施加大了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和发送,加大了相对发达省份对欠发达省份的对口支援,也采取措施加大政府在人才培养、配置和流动过程中的干预力度。应该说,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众多,以大学生为主导的人才资源的差异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与省际经济发展差异减少的趋势一致,省际间大学生数量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不同省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也不断走向全国均值,表明高学历人才的人口占比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不断缩小。由此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分布与配置格局,对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

三、讨论:大学生群体发展 与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变化

“改革永远在路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改革发展理念,正在引领和

推动中国的社会变迁进程。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和大学生群体的变革,将不再表现为规模和数量上的巨大变化,而主要表现在维持现有较大规模基础上的大学生群体内部结构的调整、分层体系的稳固和群体意识的分化等方面。

当前,高校和大学生群体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实行985高校、211高校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以后,高校之间的层级日益明晰,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日益相对集中。随着高校的发展方向、定位与属性的日益分化,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类高校等高校属性的区分,使大学生的职业去向与阶层归属有了较大差异。随着“双一流”高校改革战略的实施,高校的分层势必引起大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层与分化。当前,从改革开放前期的“必须上大学”,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必须上好大学”,对学历的重视发展到对第一学历的重视的明显变化。上大学更加容易的同时,引发了对优质高校更强烈的竞争。在学历成为一个社会流动的必备条件时,对更优质的学历的追求就成为社会流动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大学生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难度日益增大。大学生群体一直就未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联系和一致认同的社会群体。群体规模越大,群体的整合难度加大;群体成员数量增加越快,群体凝聚力建设需要克服的阻力越大;群体成员异质性越明显,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的难度越大。随着大学生群体数量的迅速扩大,大学生就业后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等方面差异较大,使大学生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不断分化。优质高校及其毕业生更多是对小群体的认同,并且更加刻意强调这种小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独特性。伴随着大学生群体基层就业、向下流动的就业等情况不断增多,这些大学生可能更偏重于对职业身份群体的认同,而不是大学生群体的身份认同。因此,大学生身份认同分化的趋势将会持续并可能愈演愈烈,这就有可能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强化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认同,增强弱势群体意识和博弈能力,生成底层政治亚文化等。

大学生群体的生存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一是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改革路径日益得到彰显,异地高考、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等凸显教育公平的措施日益增多。二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国梦,成为大学生角色期望的重要内容。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期望青年尤其是大学生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大学生就业创业成为中国就业政策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焦点从知青返城，到下岗再就业，再到进城务工青年和大学生就业创业。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确认了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大学生就业创业作为就业政策重点，大学生成为青年失业中影响最大的社会现象，日益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调整。综上，大学生群体如何发展变化，如何影响中

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将是探讨大学生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的新内容，也将是更好地推动中国良性社会变迁的新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研究”（项目编号：17BKS080）的阶段性成果]

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 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3-12.
- [2] 蒋承，张思思. 大学生基层就业的趋势分析：2003—2017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5）.
- [3] 邓希泉. 青年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愿景——中国青年发展规划及其国际比较研究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207-208.
- [4] Karl Mannheim,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J].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52: 276-320.
- [5] (美) 理查德·弗拉克斯. 青年与社会变迁 [M]. 李青，何非鲁，译.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
- [6] 桑兵.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 吕芳上.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 [M].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8] 陈映芳.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9] 郭丛斌，闵维方.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 [J]. 教育研究，2007（5）.
- [10] 胡现岭. 农村青年社会流动方式之变迁（1978—2010）——以对河南省 22 个村庄的调查为中心 [J]. 中国青年研究，2013（10）.
- [11] Frank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44-48.
- [12] 李强. 中国社会变迁 30 年（1978~2008）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0.
- [1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共组织史资料. 第 7 卷.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1976.10—1997.9）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234-1250.
- [14] 刘智，史卫民，周晓东，等. 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13.
- [15] 史卫民，郭巍青，刘智. 中国选举进展报告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38-339.
- [16]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8.
- [17] 丁小浩，于洪霞，余秋梅. 中国城镇居民各级教育收益率及其变化研究：2002~2009 年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3）.

（上接第 101 页）

- [8] Kenner, C., Ruby, M., Jessel, J.,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Events around the Computer: A Site fo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J].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008, 22 (4): 298-314.
- [9] 沈杰. 青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视角 [J]. 北京青年研究，2014（3）.
- [10] Bostrom, A-K, Hutton-yeo, A., Oh-sako, T., et al.: A Teral Assessment of TP Initiatives in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A.Hutton-Yeo and T.Ohsako (eds.),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mes.Public Policy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Hamburg: UNESC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Stoke-on -Trent: The Beth Foundation, 2000: 3.
- [11] 刘奉越，陈醒. 代际学习的国际研究进展与动向：兼对中国代际学习研究的审视 [J]. 远程教育杂志，2018（3）.
- [12] 史昱天，赵宇翔，朱庆华. 代际学习：连接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新兴研究领域 [J]. 图书与情报，2017（2）.
- [13] 徐孝娟，赵宇翔，等. 境外代际学习的研究进展及前沿展望 [J]. 远程教育杂志，2017（2）.
- [14] 徐孝娟，王绪林，等. 国外代际学习研究：理论基础、协作共享空间和 3P 实践：兼及我国代际学习项目模式的构建 [J]. 远程教育杂志，2018（3）.